

《暴风骤雨》的版本变迁与文本修改

马 亚 琳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宁夏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随着当代中国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作品的版本经过历次修改形成了不同的文本形态。从版本学的角度入手,通过对作品版本的变迁和文本修改进行对校和分析,发现背后的时代原因,把握其在适应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规范需要的同时,透视当代文学所留下的时代特征及审美意味。

关键词:暴风骤雨;版本变迁;文本修改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3)01—0069—06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作品,不仅是因为它获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还因为它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创作实践结果,是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1]。作者自己也认为“这部小说是我遵循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一次创作实践”^[2(491)]。林蓝认为《暴风骤雨》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劳动人民的光辉形象进入了被剥削阶级垄断了几千年的文学艺术领域,劳动人民不仅在经济政治上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公,而且也成为文艺作品和戏剧舞台上的主人公,从而使我国的文艺出现新面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3](185)]。因而该作品也被认为是“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较好的文艺作品”,并由此成为当代中国能够“给广大读者与一切关心新中国文艺前途的人们以阅读和研究的方便”^[4]的经典性作品之一。不仅如此,《暴风骤雨》1951年在苏联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使得苏联人对中国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发生在元茂屯的一切,差不多对于辽阔的中国的每个角落都具有代表性。周立波以纯真的手法表现了中国亿万农民觉悟的增长,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同自己世世代代的剥削者作斗争。”^[5](312)]

—

周立波于1946年10月到松江省珠河县元宝区元宝镇参加土改斗争,1947年7月完成《暴风骤雨》上卷初稿,1947年底开始在《东北日报》上连载,1948年4月由东北书店出版。1948年7月开始下卷的写作,经过几次修改于1948年12月完稿,1949年5月由东北书店出版。从此以后,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由新华书店及各地区分店、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先后编辑出版了《暴风骤雨》的不同版本。根据资料统计,相关的主要版本有:苏南新华书店出版的1949年1月第一版;1949年5月由北方出版社出版,生活·读书·新知香港联合发行所发行的第一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社出版的收入

收稿日期:2012-10-09

作者简介:马亚琳(1977—),女,回族,宁夏大学民族预科教育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1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1XZW015)的成果之一。

到“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里的1949年4月初版本,1952年4月北京重印,1952年8月北京第三版、第四版,1954年上海第5次印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52年4月北京第一版,1956年、1958年、1977年、1988年等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版;以及近年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入到诸如“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中国文库”、“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插图本)”、“红色经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周立波文集》第一卷等出版物的版本。此外还有多家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简易读物、连环画等,如林蓝改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60年3月出版的电影剧本;林蓝、谢铁骊改编,北京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修订本;杨廷治摘录、林易改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简易英汉对照读物,1985年10月版;谢明清、宋昌琴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改写的节编本,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87年第一版第1次印刷;杨根相改编、施大畏绘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的连环画。此外,还有翻译成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和外文的版本流传于世,如维吾尔文版、德文版、英文版、朝鲜文版等。

然而,在《暴风骤雨》的版本系统中,除了1948、1949年东北新华书店分别在哈尔滨和沈阳出版的初刊本保持了作品本来的面貌具有无可争议的新文学文献价值外,值得注意的版本是收入到由周扬主持,柯仲平、陈涌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社”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1956年版(该版本是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收入到“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里的1949年4月初版本作为底本进行大量修改后出版的),通过版本校勘可以发现,该版本是体现当代中国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一体化”的标准和环境,由具有代表国家权力意志的国家级出版机构出版的单行本,因而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建构成了“伟大的开始”和“新的人民的文艺”。1949年7月初,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大会演讲,强调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是“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同时提出了当代文学“伟大的开始”的口号;与此同时提出了这些经典文本“反映着与推进者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展开着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崭新的人民的时代”。^[1]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77版,周立波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劫难,他的作品也被诬蔑为“毒草”,被认为是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鸣锣开道”,“拼命宣扬布哈林的富农路线”的“反动小说”。^[6]作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再版,作者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变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激烈的戏剧冲突、性格彰显的角色塑造以及在有限的时空内高度浓缩表现与主旨密切相关的内容,都使作品更加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巩固红色政权和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需要。

因此,运用对校比勘的具体方法来考察和对比《暴风骤雨》(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本论文所参考的《暴风骤雨》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社编辑,新华书店1949年4月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52年4月重印第1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56年8月第2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8月第19次印刷)1948年、1949年初版本和1952年、1956年“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重排版)以及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再版中比较明显的文本修改,发现作品版本变迁及其修改背后的时代原因,在把握其适应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规范需要的同时,能够透视当代文学所留下的时代特征及审美意味。

二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最初的编辑策划是根据“早在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曾对周扬讲要把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挑选一下,编成一套丛书,准备全国解放后拿到大城市出版”^[7]而提出的,因而这套丛书从1948年由时任华北局宣传部长周扬的周扬组织人员开始选编工作直到1952年成立国家级的专业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接编都一直沿用的是相同的名称和编辑方针。丛书所选作品不仅代表了40年代延安文艺的基本面貌,而且被认为是“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至今依然具有典范性的意义。以1949年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作为底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52年、1956年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重排本进行对照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1952年版本基本保持了初版本的原貌,而1956年的版本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运用对校比勘的方法来考察文本中的大量修改,可以看出为适应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的需要,文本修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文本中的东北方言增加了大量的注释。周立波十分重视群众语言的学习并多次提到方言

的重要性,认为“在反映东北农村的文章里,有时用‘忙子’的完全的必要”^[8],因而在《暴风骤雨》中大量地使用了东北方言。比如在小说开端的第一段短短的二百来字的段落中,就出现了“苞米”、“确青的”、“西曼谷”、“柴烟”、“屯子”、“屯落”、“草甸子”、“牛倌”、“儿马”、“大忙子”等十来个方言词汇,“作者在吸收群众语言时,也使用了一些使别人难以理解的不必要的方言,过多地使用这类方言,势必使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受到限制或发生误解。”^[9]对于非东北地区的读者来说,如果不看每页的详细注解,很难真正理解文本的意思,从而对整个文本也很难接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增加了大量的注释。在1956年的上卷中,增加的注释多达二百多处,下卷也多达几十处。此外将原版中的某些方言词替换成普通话的词汇,诸如“电车道”改为“公路”、“毛子壳”改成“向日葵”、“老儿子”改成“小儿子”、“洋柿子”改成“西红柿”、“抬钱”改为“贷钱”、“红血”改为“鲜血”等等,以解除方言给读者造成的阅读障碍,也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后对汉语规范化的要求。

其次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突出人物的革命品质,将不利于凸显英雄人物的性格缺陷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在《暴风骤雨》中人物形象也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和中间人物,小说的本意是要突出“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农民积极分子”^[10]郭全海、赵玉林、白玉山等人,因而在1956年版本中,文本修改和删除了不利于突出人物形象高大、纯粹的细节描写。例如为了突出郭全海老实能干不善言辞的性格,将“郭全海嘴头不行,跟人翻了脸,到了急眼的时候,光红脸粗脖,说不出话来”修改成了“郭全海干活是个好手,但人老实,跟人翻了脸,到急眼的时候,光红脸粗脖,说不出有分量的话来”;郭全海这一农民中的带头人形象,在工作队长萧祥走后就被夺权并赶出了农会,为了能够让读者明白有着丰富统治经验的反动分子很容易混进农民革命队伍里,很容易窃取革命的果实,将“好老百姓说:‘郭主任是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嘴上倒不出。’”修改为“好老百姓有的给蒙在鼓里,有的明白郭全海有理,张富英心歪,可是看到张富英的人多,也不敢随便多嘴。屯里党员少,组织生活不健全,象花永喜这样的党员,又光忙着自己地里的活”,并且又增加了郭全海“到区上去找张忠谈了一次,没结果”等内容,让读者感觉到,郭全海被赶出农会也做了必要的抗争但终究因为反动分子经验丰富而无奈屈服。同时1956年版本为了进一步塑造郭全海的形象,删除了李振江老婆诱惑郭全海遭到拒绝的细节描写,让郭全海和李振江家的矛盾由个人私情上升为阶级矛盾,这样的革命形象更加纯粹,光辉。对于“党的政策的体现者”萧祥的形象塑造,为了能够将“政策思想和艺术形象统一起来”^[11],1956年版小说文本做了以下调整:关于斗争韩老六的细节,在1952年人民文学版本中为“大伙跑到操场上,一下子拥上去,狠狠揍他:‘叫人好找,揍死你这老王八操的。’”打人的事情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伙已经动手,萧队长也并没有及时制止,而在1956年版本当中则改为“大伙跑到操场上,一下子拥上去,动手要揍他,一面骂道:‘叫人好找,揍死你这老王八操的。’萧队长拦住大伙,叫他们不要动手。”调整后则更能突显萧祥的冷静和顾全大局的个性。此外还有上卷中因斗争韩老六失败,小王和刘胜产生了悲观情绪,1956年版增加的开会批评的细节;当老孙头来工作队找小队长时,萧队长积极主动召开斗争失败总结大会,而不是被动的等群众反映完问题后再开会等细节,都是为了将萧祥塑造成成熟的党的领导干部形象所进行的修改。

可以看出,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再版开始,在中国当代文学及其革命叙事的“经典化”要求下,这种对文本语言规范化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修改已经成为作者完善文本的重心,修改后的文本更能够体现新的社会面貌,新的人物成长,从而也能代表新中国的文艺方向。

三

“我只删去了几句,并在全书文字上略有改动”^[2],这是周立波在1977年《暴风骤雨》的再印刷时写在后记里的话。但实际上,从我们对其版本的对校中,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并不确切。至少某些涉及到两性相关的描写、一些不合时宜的历史表述都进行了删减和改写,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将有损于正面形象的细节描写进行了删除,进一步放大和凸显革命的英雄人物形象,无疑这些删减和改写更加符合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

在1949年版本以及1952年、1956年的版本中,存在着一些与性描写相关的内容,在1977年版本中都作了大幅度的删改,甚至是那些只是与两性关系相关的渲染也不能幸免,如身上的香味、暧昧色彩的话语、走路的姿势、衣服的样式等,使得修改后的版本体现了洁化叙事的特点。如韩爱贞勾引杨老疙瘩的情节,删去了一些直白的具有挑逗性意味的细节。1956年版本中“灯光下,韩爱贞穿着一件蝉翼一般单薄的白绸衫里面衬得水红小褂子,前胸突出,下面穿一件青绸裤子。她的头发松松散散,好像是刚睡醒了似的”,1977年版删减成了“她穿一件蝉翼一般单薄的白绸衫,下面穿一条青绸裤子”;紧接着韩爱贞和杨老疙瘩一起喝酒,酒过三巡,“韩爱贞醉了,脸颊泛出桃花色,解开白绸子衫上边的两颗纽扣,露出水红褂子来”(1956年版162页),1977年版本则被删掉;当杨老疙瘩由于紧张将扇骨折断时,韩爱贞“哈哈大笑,前仰后合,笑个不停,民歌里说:多少私情笑里来。破鞋劲的女人本能地领会这一点,这女人用笑声,用她胖手背上的梅花坑,用她从日本人森田那里练习得来的本领来勾引老杨”(1956年版本163页),这一段对女性人格贬低的描写也在1977年版本中被全部删除。而杨老疙瘩见到韩爱贞之后“神魂动荡,手脚飘飘”也被改成了“正在那里出神”,在听到韩的娇笑后“这下越发撩起了他心头的火焰”这些人物潜在的内心变化也在1977年版本中进行了删减。

第二部分第五节中有张富英和小糜子偷情的细节:“有小伙子撇下锄头跑去偷听,树丛里小糜子的声音‘别胡闹,瞅有人来了。’又听到‘不行,大白天的,我叫唤了。’可是也没有听见叫唤,光听见她吃吃地笑着,就听见风刮得榛树叶子和苞米叶子沙拉拉地发响。”(1956年版234页)在1977年版本里被删减成了“好久才出来”。第六节刘桂兰被公公欺负的情节,删去了“这个爬上炕来的家伙冷丁扑到她身上,压住她胸口,叫她气都透不出,一个鬍子叭髭的嘴巴,喷着热气,伸出寻她的脸蛋”(1956年版263页)这些露骨的描述性内容,只剩下“有个什么人爬到她炕上,把她惊醒”而一笔带过。此外还有在第一部分第一节中老孙头向萧队长及工作队的同志讲述胡子在村子里“白日放哨,下晚扎古丁,叫娘们把裤子脱光,还得站起来给他们瞅瞅,真不是人做得出的呀”(1956年版8页),在1977年版本里简化成了“还侮辱娘们,真不是人”。在1956年版本中,第二次斗争韩老六,白胡子老头为了转移大家的斗争注意力,故意询问韩老六是否糟蹋过妇女,韩老六嬉皮笑脸地回答:“有十来多个呢。”到了1977年版本中修改成了“我有罪,有罪”,韩老六认罪态度的修改也是为了更加符合全书严肃庄重的历史革命主题。

以上关于两性的内容在具有重大革命教育意义的作品中出现明显不合时宜,因而作者进行了大量删减与修改,增加了小说文本冷静客观的叙述效果,因而使作品更加符合新的时代环境。

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历史叙述的改动,较为明显的是对林彪、苏联叙述的改动。林彪由革命的功臣变成人民的敌人、反党分子,自然在文本里就不应该再出现他在解放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因而,1977年版本中将“想起林彪同志在哈尔滨南岗铁道俱乐部里的讲话”改成了“想起了松江省委的传达报告”;将“林彪将军率领的民主联军,遵照毛主席的战略,把蒋匪的美械军队打得大败了”改成了“人民军队遵照毛主席的战略,把蒋匪的美械军队打得大败了”;把“咱们林司令带的兵在前方打胜仗了”。改成了“毛主席的军队在前方打胜仗了”(1977版447页);将“贴着毛主席、朱德司令和林司令员的放大的照片”改成了“贴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肖像”(1977版464页)。有关苏联的叙述也进行了改写或删减,如将“苏联红军”改为“八路军”,或改为“八路军三五九旅三营”,甚至有的地方直接删掉。

关于人物形象的修改主要是对英雄人物赵玉林的修改。赵玉林形象的处理曾经有人提出质疑:表现我们的主人公刚翻身以后便牺牲是否适当,是否会引起农民对于革命事业发生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9]的感觉而畏缩不前……因而作者对赵玉林临终前的描写进行了修改。1956年的版本中是“给我添一枪吧……快添一枪吧,我的妈呀”,在1977年版本里改为“我不行了,你们快去撵胡子,甭管我了”。改动之后,赵玉林由原来的普通农民形象变成了一个将个人生死置身度外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显得更加高大光辉。赵玉林的死是悲壮的,但就在他倒下的那一瞬间,就在他决绝地为工农的解放事业牺牲的那一刻,文本也似乎达到了对民众进行更高意义的革命教育,那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对劳苦大众的激励和鼓舞,觉悟了的从土地上站起来的农民,是如何不顾一切的走上前线”^[12],这也正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重要的原因了。此外还有对老孙头的细节描写,1977年版本删除了不利于老孙头形象塑造的性格弱点,诸如他听到枪声“吓的跌下了车子”,说话做事犹犹豫豫,

摇摆不定等细节。他在第二部第四节中撕下“主任训话处”的牌子,“算是从心底里报了张富英那一皮鞋的仇了”,在1977年版本里被改成了“姓张的这狗腿子主任,我们扔定了”,加强了人物的革命性,将其进一步塑造成一个“农村里贫雇农阶级中的中间分子,群众思想动态的代表人物”,所以他成为《暴风骤雨》中“人物写的最突出的一个”。^[12]

此外,在1977年版本中去掉了一些容易理解的注释,诸如“好赖”、“整乱套”、“光腚”、“耍大钱”、“哈腰”、“耷拉”、“备不住”、“抖起来”、“穿兔子鞋跑”、“里里拉拉”、“土豆子”、“窝瓜”、“地全扔了”、“黏黏巴巴”、“拿枪崩掉”、“官麻”、“点籽”、“码麦子”、“粳米”、“穷棒子”、“捣腾”、“驴打滚”、“暴烟雪”、“脚脖子”、“不老少”、“小丫”、“坎肩”、“见天”、“气急眼”、“溜须”、“堆垛子”、“泔水”、“钢枪”、“大酱”、“够下水”、“苞米杆子”、“拿出命来干”、“嘀嘀咕咕”、“抖擞”、“秫秸”、“半拉架”、“二虎吧唧”、“洋柿子”等近九十处注释,读者基本可以理解是什么意思,因而在现版本中都被删除掉。

四

金宏宇认为:“副文本因素为文本提供一种氛围或视界,也为阅读文本提供一种导引,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13](7)}在阅读《暴风骤雨》时,我们会发现副文本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作者顺应时代变化对题记所做的更改。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暴风骤雨》上卷时,正是解放区土改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时候,周立波认为这部书对当时的土改工作有一定的帮助意义,于是他写下了如下题记:“上卷内容是去年7月东北局动员一万二千干部组织工作队,下乡开辟群众工作的情形。东北农村封建势力的最初垮台和农民中间的人物最初出现的复杂曲折选择,就是本书的主题。——作者。”而在之后的版本中就再也没有见到这段内容,伴随着土改运动的完成,这段文字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相反在《暴风骤雨》的多次再版中,扉页上引用的毛泽东的一段话却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十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毛泽东。”这样的不变既是作者对文本主题精神的一种坚守,恐怕也是周立波巧妙地借用毛主席这个巨大的保护伞来保护自己的一种策略。

其次,从初版本到1977年版本,无论是封面字体、底色还有图案都在发生变化。据统计,封面设计大概有:初版本的农民手拿大刀长矛向前冲,书名为鲜艳的红色,封面底色为淡红色,充满了革命的意味。随后可以看到的版本封面还有1950年收入到“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当中的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的木刻版画封面,1952年版的剪纸采摘封面以及一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所采用的农民在红旗下分地打楔子的封面;其中经过对校还能够清晰地发现这个封面也在随后的再版中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突出分地打楔子,举着红旗的农民变成了红旗较为突出,农民是在党的红旗的照耀下,兴高采烈地分到了土地。底色的变化是由红色变为较深的象征东北黑土地的颜色再到淡红色,书名也由鲜艳的红色变为黑色再到血红色。这些变化无疑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由最初的剑拔弩张的土地“革命”到新中国土地改革完成后的一派欣欣向荣,再到粉碎“四人帮”后的低沉(1977年版本恢复土地颜色),直至八十年代再版时的“红色经典”象征。然而和这些仅有的封面“副文本”因素不同的是,《暴风骤雨》在《东北日报》连载时,每一节都配有古元画的图片。1948年该书再版时在小说的正文中间将连载时的图片减少成9幅,并且每一幅图片都配有一句简明扼要的文字说明,高度浓缩地介绍了图片所在章节的小说情节,能够彰显出土地革命在如火如荼地全面开展,让人民轻松地接受这部革命历史小说所要传递的主题,那就是土地政策的宣传。伴随着中国土地革命的完成,从1977年版本开始,这些插图全都被删减掉,彻底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总的来说,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小说《暴风骤雨》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这些修改无论是正文内容的修改还是副文本内容的调整,都会带来版本本性的改变。历次的修改和调整一方面是作者更加完美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主要是作者需要按照新的创作原则来积极呼应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以达到并体现出当时国家对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统一要求,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阅读接受与文学批评方面的调解与控制。修改后的版本既保留了东北方言给读者带来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同

时对一些历史表述有了更准确的表达,体现了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当然,《暴风骤雨》是周立波响应《讲话》中提出的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号召而创作的一部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因为遵循革命的现实主义写作,作者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再现所看到的一切,所以必须“集中,还要典型化”,因而有损于表现革命者革命品质的描述、有损于深化阶级属性的内容在文本中都被删除掉,人物形象高大光辉,但也失去了鲜活的一面,显得有些单薄。而为了符合相关的政策,在文本中加入了正确执行政策的情节描述对文本的故事性也有所影响,这些并不是本篇所探讨的重点。通过版本对校,发现作品版本变迁及其修改背后的时代原因,把握其在适应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规范需要的同时,透视当代文学所留下的时代特征及审美意味,才是本文的主旨。

参 考 文 献

- [1] 周扬. 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 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A].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C]. 新华书店,1950.
- [2] 周立波. 暴风骤雨[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 [3] 林蓝. 战士与作家——《周立波论文集》编后记[A]周立波研究资料[C].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4] 周扬.《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辑例言[M]. 周立波. 暴风骤雨. 新华书店,1949.
- [5] B·卢得曼娜.《暴风骤雨》俄译本第一版前言. [A]周立波研究资料[C].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6] 刘锡诚. 谈《暴风骤雨》及其评价问题. 周立波研究资料[C].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7] 箫玉.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开启文学新纪元[N]. 石家庄日报. 2009-09-19.
- [8] 周立波. 谈方言问题[A].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周立波专集[C]. 华中师范院校中文系编,1979.
- [9] 陈涌.《暴风骤雨》周立波研究资料[C].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10] 周立波.《暴风骤雨》的创作经过. 周立波研究资料[C].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11] 周立波. 关于写作[A]. 周立波文集(5)[C].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 [12] 蔡天心. 从《暴风骤雨》里看东北农村新人物底成长[A]. 周立波研究资料[C].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13] 金宏宇. 新文学的版本批评.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A Study of the Edition Alteration and Textual Modification in *The Storm*

Ma Yal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hanxi Xi'an
710062; Ningxia University, Ningxia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The Storm* with the chang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ideology, a version of the work formed after the successive revisions of different text form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version, this article found the reason behind era, grasped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t the same time, and analyzed the times' characteristics and aesthetics means left by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Keywords: *The Storm*; edition alteration; textual modification